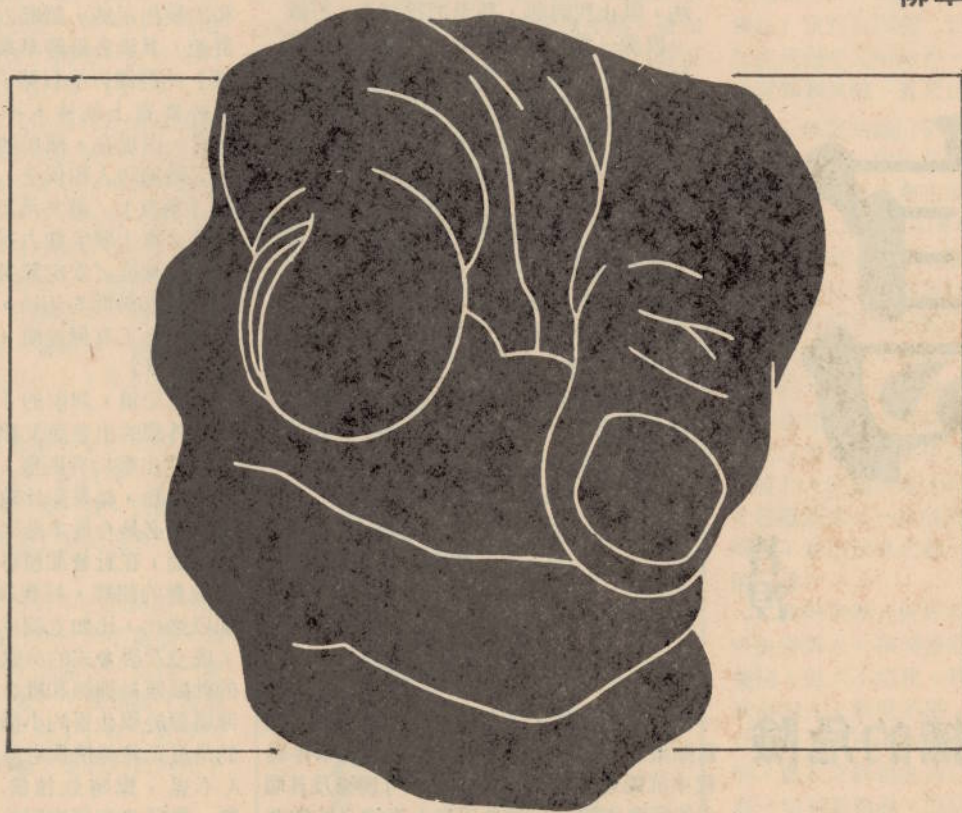


英國工黨與香港工運

——端拿中期報告書

柳華川



1

一九七六年英國政府的「外交及聯邦辦事處」(FOREIGN & COMMONWEALTH OFFICE)禮聘了專長於勞工事務研究的英國教授端拿(H·A·TURNER)進行一項工會研究,以探討香港勞資關係、勞工組織以及集體磋商等有關工會發展的問題。當年,端拿教授到達香港從事調查研究,並得到香港勞工處及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協助,進行一項一百名工廠工人的試樣調查(PILOT SURVEY)及一千名工廠工人的普查,端拿報告書於一九七七年初面世,這只是中期報告,流於描述性,但亦引起香港工商界及英國有關當局的注視。

據悉,端拿教授經已完成了最後報告書,但經過二年的拖延,還未有打算公開,其中可能具有某些政治或社會因素,一九七八年曾經有國會議員就此事質詢工黨政府,但答覆是含糊其詞,另一方面,英國最有權勢的工聯會(TRADE UNION CONGRESS)也慎重其事,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專研究端拿中期報告書,該委員會也出版了一份專供內部傳閱的文件,對端拿中期報告書提出了看法。

2

稍為熟悉香港工會情況的人仕都知道香港工會大致可分為三股勢力。它們是親北京的工聯會(HK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親台灣的工團總會(

HK TRADE UNION CONGRESS)及沒有政治傾向的獨立工會。在七〇年代初期,香港工人參加工會的數目有明顯的增加,從一九七〇年二十萬增至一九七五年的三十六萬人,從佔全港工作僱員百分之十六跳至百分之廿四。這種增幅當然與中國外交的溫和傾向有關,使依附於工聯會的工會會員達至廿七萬,而工團會則只有四萬人,比獨立工會的人數五萬五千人還少,這種由於工會人數增加而引起的力量對比當然使親北京的工聯會足以左右香港工會運動的發展,但當讀者留意近年來香港工會活動的浪潮之中,卻不是以工聯會或其附屬的工會所推動的;在此筆者需要稍為註釋一點,這類活動是指工會取向的而非其他超過工會運動的活動,如政治宣傳等。則我們可以明顯得出一個結論,佔據着香港電視、報紙的工業活動絕

大部份是由獨立工會所霸佔了，這一點端拿教授也清楚的指出。

端拿中期報告書的結論是，香港的工人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性質阻止香港工會運動的發展，但是，他指出，除了少數例外之外，在一般的意義上，香港的工會並不算是工會，實質上它們屬於文化團體、聯誼或政治組織。它們的會費太低，並不是以聘請有效率的工會組織者；而直至目前有關工會法例也禁止聘請全職的組織人員，香港工會設有車間工人組織更是絕無僅有的，工會缺乏工業政策而同時缺乏鬥爭性，尤其是工聯會。鑑於北京的政治氣候，就算工會會員被辭退或遣散，亦止於提出意見而盡量避免擴大工業糾紛。工聯會極力避免介入社會事務及工業改革運動之中，而且不願意與官方進行任何聯繫，至於工團會，端拿指出它亦是非工業取向，況且工團會會員數目日益減少而且政治前景黯淡。而其他獨立工會則數目太多，而且大多是政府僱員工會，具有特定利益。

鑑於上述分析，端拿認為香港工會運動的發展只有寄望於政府的努力及外來壓力。就着工會運動的展望，端拿教授似乎並不樂觀，他在中期報告書中的結論，傾向於提出透過社會政策的改革，以期達到保障香港工人的福利，例如端拿提出一九四〇年通過的 TRADE BOARD ORDINANCE 是容許設立法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但從沒有工會利用這項法例從事改革，端拿亦似乎同意他的研究小組的另一位成員，耶魯的人類學教授 KEITH HART 的意見。PROFESSOR HART 在解釋了香港工會發展困難的原因之後，指出改善香港工業關係只有從事社會保障改革，教育政策及房屋政策改革等。

3

明顯的，兩位英國研究者都未能就着香港工運的發展提出改革的良方，最為端拿教授推舉的最低工資保障嚴格來說也只是滿足於社會需要而對工運的發展沒有任何實際幫助，這是否表示了兩位教授對香港工會非工會化的表現束手無策呢？

正如廣東一句俗語：「老鼠拉龜，無處下手」，端拿中期報告書未能為香港工運發展提供實質的建議，我們亦不可能期望端拿的最後報告書有任何新穎的提議。但相當明顯的，端拿既然不能提出工會組織、集體磋商的策略方案，他當然傾向於建議政府在立

法行政上加強勞工法例的改革，以及影響工人的社會保障計劃，如最低工資、退休金計劃等着手，這樣的話，則可能出現一個極之有趣的情況，一個具有殖民性質的政府居然比聲稱為工人爭取權利的工會更積極改善工人的福利。這也只是在香港現存的情況下才可能發生的。

據本刊從英國獲得的可靠消息，端拿最後報告書將會於年中出版。這份影響香港社會發展的報告書將會賣什麼藥，我們很快便會知悉的。

4

對工會運動來說，香港政治性工會是扮演着一個倒退的角色，企圖使香港工會將非工會化的傾向，這種方針對於一個轉變迅速而尋求改進的社會是相當落後，這一點也解釋了為什麼工會的努力只保留於運輸及傳統性的工業裡，至於本港迅速發展的製衣業、電子及玩具業，工會的發展可說是停滯不前。而這幾個行業是吸收了年青工人而在戰後成長的一代，他們的社會意識及價值觀念與上一輩的工會會員有極大的不同，筆者相信不單止端拿教授對工會組織的發展苦無良策，就算勞力最大的左派工會對這羣新起的一代工業工人也沒有妙法去吸收入工會，尤其是目前工會仍然維持非工會化的取向。

筆者認為左派工會在香港現存制度所起的作用，是受著外在因素影響的。左派工會若果多攪經濟鬥爭，嘗試改變工作作風，亦不一定不能吸收到年青一代工人。但在中英和中、港關係一片「大好」和港督宣佈官式訪華的情況下，相信這個可能性不大。況且左派企業正在香港大展拳腳，攪經濟鬥爭不難攪到「自己人」頭上。

5

在目前工運結構不變情況下，大部份工人的利益看來還是由勞工市場的規律和零星的自發鬥爭決定。英國的工黨人士縱然有心推動香港工運，亦很難突破目前的局面。他們的貢獻，或許使港府施行多些社會福利吧。



……
“兩位英國研究者都未能就着香港工運的發展提出改革的良方，最為端拿推舉的最低工資保障，嚴格來說也只是滿足於社會需要而對工運的發展沒有任何實際幫助，這是否表示了兩位教授對香港工會非工會化的表現束手無策呢？”……